

毛泽东46次登天安门,第一次非开国大典

至今,人们仍爱把天安门和毛泽东主席联系在一起,一看见天安门,就会想起毛主席。据统计,从1949年7月7日至1971年5月1日,毛泽东先后46次登上天安门城楼。一般情况下,毛泽东都是在每年的“五一”和“十一”各登上城楼一次。但在1966年的特殊年份里,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这100天的时间中,毛泽东曾8次登上天安门城楼,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约1300万人。



1949年7月7日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

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并不是开国大典,而是在1949年7月7日。当天为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,天安门作了精心的布置。

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7个大红灯笼,城台周围插着32面鲜艳的红旗,城楼正中挂着一个巨大的红五角星,两边分别是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。整个广场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。这天,北平城风雨交加,大雨下个不停,北平20万市民顶风冒雨汇集到天安门广场,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盛大集会。

晚8时,大会在七七四十九响礼炮和雄壮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中开始。晚9时20分,

毛泽东莅临大会。当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,20万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。“毛主席万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的口号声此起彼伏,响彻云霄。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,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不约而同地向他欢呼。

1949年10月1日在城楼上站了6个多小时

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天,面对万众欢腾的大游行,毛泽东从下午3时到晚上9时25分,一直站在城楼上向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。他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,从城台的东边走向西边,又从西边走向东边,频频向群众招手,右手举累了,就换左手,左手累了又换右手。广场上川流不息的群众一面高呼着口号,一面向前走,走到面对城楼的时候,

都停下来高声地呼喊“毛主席万岁”。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主席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,再三劝说他休息一下,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,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先生交谈起来。可是,连水还没来得及喝一口,周恩来又走进来说:“主席,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,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,看来你还得站下去。”于是,毛泽东又起身回到主席台上,与游行的群众亲切互动。

1971年5月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

1971年5月1日晚上,节日的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。天安门城楼上,78岁的毛泽东和往常一样,向群众招手致意。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面,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,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

侧,最西侧是林彪的位子。在烟火晚会开始时,“一贯紧跟”的林彪却姗姗来迟,毛泽东只是略略朝空着的座位瞥了一眼,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,仿佛根本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。令人诧异的是,林彪到了之后也没跟毛泽东打招呼,只坐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。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,并没有表现出不快,继续和西哈努克亲王谈话,不时地望着绚丽多彩的天幕,微微张着嘴,露出亲切和善且带有童趣的笑容。

从1971年5月1日以后,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走上过天安门城楼。同年国庆节天安门也没举行庆祝活动,自那以后,每年两次的天安门前的庆祝游行活动也就此停了下来。(摘自《北京晚报》)

1921年,上海爆发信托交易风潮

1920年7月,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之时,正逢一战结束之后,国际市场需求骤降,社会游资不着“投资蓝海”,大批初创企业却嗷嗷待哺,这就给新生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提供了担纲“资金媒婆”的用武之地。再观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,经营顺风顺水,一炮即红,开张仅半年就净赚50余万元,折合年利润率高达80%,而其时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利率只有10%左右。因而,不少投机者连信托交易所“ABC”都没弄明白,便将其视作有暴利可图的“摇钱机”,各色人等一哄而起,纷至沓来,生怕错过了发财良机。

投机分子“脑洞”大开,充斥于市的游资潮水似地涌入信托交易领域,一时间申城“同声附和者,风起云涌”。至1921年夏秋之际,上海便诞生了140余家交易所,信托公司亦有12家之多,甚至出现了“仅挂一筹备招牌,其一元一股之认股证,执有者亦居为奇货”的怪象。纵览行业分布,除了公债、股票、标金、棉纱之外,连烟、酒、布、麻、煤油、火柴、砂石、泥灰等行业,也相继挂出了交易所的招牌。

雨后春笋般冒出的交易

所,有的专门从事证券投机,有的兼做物品买卖,但多以炒卖炒卖股票债券为主营业务,暗地抬价,牟取暴利,一门心思挣快钱,交易时间竟然推行“白加黑”“5加2”,疯狂程度可见一斑,也为日后的大崩溃埋下了伏笔。

按照191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所法,一个地方同种类型的物品或证券的交易所只能设立一家。这些滥设的交易所自告知难以获得政府批准,纷纷进入租界寻求庇护和注册领照。而租界当局只管收取注册费,睁一眼闭一眼,来者不拒,也成为这波风潮的幕后推手。

畸形繁荣的信托交易所扰乱了市场秩序,经营风险越来越,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出手整治,加上一些讲究稳健的银行对从事投机的信交机构抽紧银根,遇有危机萌芽立刻拒绝放款。这样一来,靠借贷为生的投机者资金运转失灵,证券价格暴跌,只剩下破产一条路了。众多信交机构一夜消失,市值蒸发,股票信誉扫地,股民所遭受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。至1922年4月,上海的华商交易所只剩6家,华商信托公司仅存2家勉强撑持。

(摘自《档案春秋》黄沂海/文)

唐玄宗李隆基有个特殊的癖好——喜欢改名字。也许是因为他想长长久久地当皇帝,所以他的改的名字大部分都和修仙问道有关。比如黄山原名黟(意为黑色)山,因其山峰和岩石遥望青黑而得名。传说黄帝就是在这里成仙的,唐玄宗一听,就想巴结一下已经成仙的老前辈,于是这座山就随“黄帝”叫黄山了。

同样因为向往修仙被改了名字的还有崂山。天宝元年(742年),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去崂山寻了次仙。不管李白有没有见到仙人,反正他写了一首诗,说自己“亲见安期公,食枣大如瓜……愿随夫子天坛上,闲与仙人扫落花”。远在千里之外的唐玄宗听便来了精神,既然山里真的有神仙,这座山叫崂山就不大合适了,以后就叫辅唐山吧。不过后世皇帝看不惯,又改过了崂山,唐玄宗算白折腾一把。

唐玄宗不仅喜欢给山改名字,就算是普通的植物,他看了一眼也要给它们改个名字。安史之乱时,唐玄宗南走秦岭入川,他看见石楠树冠齐整,想也没想就把石楠

的名字改成了端正木。他还喜欢给儿子和大臣改名字。唐玄宗刚刚登基,就把自己几个儿子的名字改成“水”字旁。没过多久,他又觉得自己改名影响大唐气运,既然是帝王气息,君子从玉,所以又把儿子的名字全部改成了跟玉有关的字。他自己动动嘴皮子的事,却忙坏了造金册玉谱的大臣。

更离谱的是,唐玄宗连部分官署名也改了。开元元年(713年),唐玄宗破天荒地自古以来掌管文秘书要、发布政令的要害官署中书省更名为紫薇省。以花名做官署名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,极为特殊。这与当年中书省官署多种植紫薇,以及唐玄宗笃信紫薇能压邪扶正有关。于是,在紫薇省为官者也就自然被冠上“紫薇”的雅号,中书令谓之“紫薇令”,中书侍郎则称“紫薇郎”。一个大男人的官名叫紫薇,可以想象每次被称呼时这些大臣的脸色一定比紫薇花还要好看吧。

因为唐玄宗的生日在八月初五,为避讳,端五被改成了端午,不知屈原若地下有知会是什么表情。

(据《百家讲坛》夜楹/文)

北大为何没有校训

《新青年》杂志大力推进新思潮,最终形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衰腐的伦理道德的新文化运动,就遭到文化保守派的猛烈反抗。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是北大原校长严复,另一就是著名翻译家林纾,都是当时文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,而且他们对中国近代文化是有过重要贡献的。当时林纾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文化、新思潮,尽管他自己二十多年前也主张过改革,但此时转向保守,认为只有抵制西方的影响,回归古代文化与伦理,才能救中国。

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80多种,是当时大师级人物,他看到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写作,是深恶痛绝的,所以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北大。1919年2月林纾在上海《新申报》发表两篇小说,用一些化名影射陈独秀、胡适与钱玄同,甚至进行人格侮辱。当时有些读者认为林纾是借小说暗示要求军阀政府干预北大行政。林纾还在报上发表公开信《致蔡元培书》,控诉北大“尽废古书,行用

老北大的成功,首先在于办学理念先进,其办学理念集中体现在八个字: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。这是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理念。北大至今没有校训,但事实上,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已经成为一代代北大人记忆最深的警句,也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北大校训。

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通常被看作我国第一所现代形态的大学,其实这个所谓“现代形态”时间有些提前了。1898年建校之后,有十多年时间,很难说就是现代的大学。当时文科基本上是桐城派与“文选”派的天下,学生则以官员或者官宦子弟居多,学校风气相当陈腐而且保守。学生称呼老师不是叫老师、教授,而是“大人”“老爷”。

直到1916年,北大才转变风气,真正朝着现代大学的方向来办学。这是因为来了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。

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,校风好转,教师、学生道德水准得到提高。

具体来说,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这两句话到底出自哪里?让我再从源头来说吧。

当陈独秀、胡适等人通过

水泊梁山是个公司

捧读《水浒传》,常常有种幻觉,这个水泊梁山怎么瞅怎么像公司。这可不是笔者胡侃,不信咱们可以细品。

梁山是个股份公司,据说光股东就有一百零八位。事实上,梁山股份倒没那么分散。公司的原始股是创始人王伦系的一帮土鸡瓦狗,也就林冲在东京(今开封)待过,眼界开阔,脑子活泛,但不受王董待见。过江龙晁盖来投奔,王董照例拒绝,林冲憋了一肚子火,让人家一掬掇,火并王伦,拥戴晁盖当了董事长。晁董雄才大略,聘请同样雄才大略的宋江当CEO,梁山事业登时蒸蒸日上。后来,晁董在曾头市商战中意外陨落,梁山正式进入宋江时代。宋江深知公司弊端,毅然舍弃了晁盖时代的公司方略,联合新任CEO卢俊义,提出投奔大宋集团的大政方针。可惜,时机不到,宋董听到许多反对声音。

说起梁山公司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,地处大宋集团腹地,有祝家庄联合体、曾头市公司、高唐州公司等群狼环伺。亏得宋董英明神武,目光高远,不仅整垮了这些“狼”,还收伏了清风寨、江州、芒碭山、二龙山诸多小公司,把大宋集团众多高管斗败,收为小弟。但宋董深知大宋集团乃庞然大物,凭手中这些虾兵蟹将,根本没指望取而代之。

于是,宋董对梁山高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首先划分出天罡、地煞两个层级,并搞了个排名榜单,拉拢了一批原先大宋集团的高管,有意无意地压制了一批出身不高的梁山原有高层。其次对职权范围进行精细划分,不仅有五虎、八骠、十六小彪这些主力配置,连食堂、屠宰、捧旗这些琐碎事都有了分管。接着,宋董搞了四大董事,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中选意外陨落,梁山正式进入宋江时代。宋江深知公司弊端,毅然舍弃了晁盖时代的公司方略,联合新任CEO卢俊义,提出投奔大宋集团的大政方针。可惜,时机不到,宋董听到许多反对声音。

终于,宋董经历风雨见彩虹,如愿加入大宋集团。要说姜还是老的辣,大宋集团的CEO蔡京、COO高俅让梁山公司去跟辽国集团、淮西公司、河北公司、江南公司火拼商战。虽赢得最后胜利,梁山公司也元气大伤,宋董因此含恨而亡。(摘自《讽刺与幽默》古微狂生/文)



土语”“复孔孟,铲伦常”“尽反常轨,侈为不经之谈……令人心丧弊,已在无可挽救之时……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”。林纾严厉警告蔡元培搞教育勿“趋怪走奇”,误国误民。蔡元培当即在《公言报》复函,这封信被广为引用,事实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支持。信中驳斥了林纾对北大所谓“复孔孟,铲伦常”,以及“尽废古书”的谣言,不符实际,鲜明

托德·洛克伍德是美国著名小说家、诗人理查德·布劳提根的忠实粉丝,他仔细读过理查德·布劳提根的每一部作品。1984年,布劳提根去世后,洛克伍德十分伤心,总想为偶像做点什

一天夜里,洛克伍德难以入眠。他猛然记起布劳提根在一部作品中虚构了一家图书馆,那里收藏的都是被出版商狠心拒绝的书稿。图书馆内只有一位管理员,既没有读者,也不对外开放,纯粹只为抚慰作者受伤的心灵。

何不筹建一家这样的图书馆,怀念自己的偶像呢?洛克伍德开始实施他的构想,四处搜罗退稿。可是,几年过去了,洛克伍德还是没有收到多少退稿。但出于赤诚,1990年,他的“布劳提根图书馆”还是在华盛顿州拉克县的一间小房子里开张了。

起初,洛克伍德谨遵布劳提根小说里的设想不对外开放,可总有好奇的人闯进来一探究竟。映入人们眼帘的几排书架上散落着的几部书稿,几个摆在不同位置的蛋黄酱罐子突兀地刺激着眼球。人们一番探问后,方知这些罐子是用来分类图书的,灵感同样出自布劳提根的小说《在美国钓鳟鱼》。人们叹赏不已,纷纷要求图书馆对外开放,洛

地提出这样的办学理念:“对于学说,仿世界各大学通例,循思想自由原则,取兼容并包主义……无论为何种学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,虽彼此相反,而悉听其自由发展。”

这就是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来路。

一个学校除了有大师,有大楼,还要有校园故事,有许多能成为一代代学生不断传说的故事。北大总有许多性情中人,许多有风骨个性的学者,他们的故事往往就负载着、积淀着学校的精神传统。不要小看这些校园故事,一代代北大人所接受的传统滋养,很多就是从中获益的。北大是个多故事的地方,也是传统深厚的精神高地。当一种校风形成,代代相传,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。这正是北大可爱的地方。

退稿图书馆

克伍德接受了大家的建议。对公众开放后,图书馆渐渐热闹起来,不仅读者络绎不绝,各种退稿也纷纷至沓来。看着这么多退稿愉快地聚在一起,洛克伍德更加兢兢业业,除了日常维护,他开始对作品进行精选点评。查尔斯·格林17岁那年创作的《爱永远美丽》,从完成到进入退稿图书馆,其间一直都在寻找出版商,却屡屡碰壁,因被拒稿459次,洛克伍德将它评为“世界拒稿之最”;农妇比阿特丽斯·奎恩创作了诗集《鸡蛋下》两次,洛克伍德给她这本诗集的点评是:一个养鸡场女主人26年的生活智慧总结……

渐渐地,洛克伍德的小房子装不下越来越多的退稿,正在他发愁之际,拉克县博物馆伸出了橄榄枝。迁址之后,退稿图书馆的名声更加响亮,俨然成了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。而今,退稿图书馆专门开发了“蛋黄酱系统”,将所有书稿根据15个大类、提交年份和获取顺序进行编目,同时允许作者提交未发表电子手稿。

退稿图书馆看似是噱头,实则充满温情。在这里,人们得到的是心灵的抚慰,而图书馆存在的价值,大概就是如此吧。(据“青隐书房”微信公众号)